

歌德的《浮士德》：诗与哲学的交汇

(美) 加布里尔·R·里奇 著

李建康 译

一、哲学诗人

乔治·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 在他 1910 年的系列讲演中 (随后出版为《三位哲学诗人》) 暂时将歌德归为哲学诗人。他毫无保留地将但丁和卢克莱修归为这类诗人。他们的主要著作都将他们置于他们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中: 桑塔亚纳认为,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达到了古代自然主义的顶峰; 而但丁的《神曲》则体现了中世纪的超自然主义。由于歌德的《浮士德》对《圣经》的独特解释以及其“对建造世界的青春的自信”的态度, 桑塔亚纳毫不含糊地将《浮士德》置于德国浪漫主义的语境下; 不过, 仍然只不过是歌德“对生活的思考比较新颖并且无所不包”罢了。¹ 桑塔亚纳在《浮士德》中只发现偶然的哲学和存在思考, 他认为, 这些思考典型体现了浪漫主义对经验的主观直接性的专注。虽然如此, 它们包含了一种实用宗旨 (a pragmatic charter) 和哲学观, 可以说, 这种哲学观是浮士德得救的基础。

桑塔亚纳对歌德的《浮士德》所作的哲学解释, 有很多依然具有生命力, 特别是歌德号召我们要从现象本身去进行理解。要求用现象学的方法对待事物本身 (胡塞尔所说的 *zu den sachen selbst*, 或者歌德的《浮士德》中所出现的 *zu dem Leben selbst*), 是歌德《浮士德》中诸多哲学观中的一种的来源。除了浮士德非常规的圣经解释 (这是桑塔亚纳所探讨过的), 还有其他一些浮士德的现象学药

¹ George Santayana, *Three Philosophical Poets: Lucretius, Dante, and Goeth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3), 128. 桑塔亚纳书中关于歌德部分的章节标题为《歌德的〈浮士德〉》(“Goethe's Faust”), 因此强调了歌德的某一具体作品对于诗歌的哲学精神的体现的重要性。

本文来自《浮士德》的诗行数在括号中出现。我依据《歌德的浮士德》(*Goethe's Faust*), 第一部和第二部, 由加尔文·托马斯 (Calvin Thomas) 编 (Boston: D.C Heath & Co., 1892-97)。某些情况下引用了德文原著, 译文由我自己翻译。我的译文也受到了彼得·萨尔姆 (Peter Salm) 杰出的第一部译文的影响, 由 Bantam Books 于 1962 年首次出版。我本文用的是 1985 年版。浮士德故事的最后几行 (12104-12111) 对于译者来说至今仍是难题。我借鉴了保罗·维甘德 (Paul Wiegand) 的文章《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的“神秘的合唱”中的种种问题》(“Problems in Translating the Song of the Chorus Mysticus in Goethe's Faust II”), 载 *The German Quarterly*, Vol. 33, No. 1 (January, 1960), 22-27. 文章建议译者忠实于实际字词, 让这段紧凑的诗的意思自然浮现。要理解这最后的字词如何总结了歌德《浮士德》中的积极女性形象, 参见麦克莱恩 (William H. McClain) 的文章《作为有意义的形式的歌德的“神秘的合唱”》(“Goethe's Chorus Mysticus as Significant Form”), 载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 74, No. 1 (January, 1959), 43-49. 麦克莱恩还为浮士德的救赎提供了一种解释, 认为是浮士德的“immer höhere und reinere Tätigkeit bis zu Ende”(与艾克曼[Eckermann]的对话, 1831 年六月六日, 第 44 页, 第 8 面) 以及体现在上述最后几句“神秘的合唱”中的仁慈和爱相结合的结果。歌德对女性的提升便对应着但丁所赋予的女性 (比阿特丽斯·雷切尔·露西娅) 的救赎价值: “地狱”篇的开端, 她们在他需要的时候俯视着他; 当他质疑进行精神朝圣是否值得时, 她们俯视着他。